

■知无不言

# 活力与秩序两者不可缺一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要塞(fortress)从来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内部人与外部人互不沟通,它需要有个准则和机制来区别内部人与外部人。城镇(town)则是个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基于这座城镇的吸引力,选择进入或离开。充满活力的城镇具有强大吸引力,而要塞则不同。”

这段话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理查德·瓦格纳在评价奥地利学派米塞斯(Mises)研究时所说的。后来,这句话又被奥地利学派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在比较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时所引用,认为前者的风格是一座“城镇”,开放而有吸引力,因而目前占据主流经济学的显赫地位,影响力非凡,后者则是一座“要塞”,隔绝而又封闭,故而其影响力不及芝加哥学派,但有自己的原则。

这个比喻的确很精彩。想想在境内外所见到的,以及文献中所描述的那一个个要塞,不是大多处于“一夫守关,万夫莫开”的山巅或山口要害之地,或者堡垒高耸,或者城墙绵延吗?而那一座座没有围墙的现代城镇,则是人来人往的集散地。但我今天引用瓦氏的这段话,是由此想到了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经济生活:恐怕“城镇”与“要塞”都是我们所离不开的。

先说“城镇”吧,当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主动将思想、政策、地域上的“要塞”打开了,看到了“塞外”风景的炫目多彩,尝到了飘入“塞内”空气的清新爽朗,感受到了打通“要塞”后的天地开阔,不仅不再恐惧“塞外”人走进来,我们也大踏步地走出去,自信心越来越强。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变成了一个有着强大吸引力和充满活力的“城镇”。而且,原来居住在这座“城镇”的主人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地向全人类发出稳健的理性呼声,越来越多地参与制定或改进规则,倡导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回想以往历史,在整个中华大地成为一个“要塞”的时代,我们不但没能独享“要塞”的安全,反而使“要塞”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即使倾全力保护也还是危机四伏。可见,经济

在过去这些年“推倒要塞”与“建设城镇”的过程中,那种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否定并推倒“要塞”的倾向是值得好好反思与总结的。不顾我们的发展阶段及其变化,不顾境内本土资本与人才实力的增强与需求,一味为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在尚不成熟的金融领域对外宽松对内严格,所有这些,无不是罔顾建设“城镇”所必要的理性“准则与机制”的结果。而没有了理性准则与机制的支撑,市场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转、全球良好秩序的维持以及人类文明进步,就都谈不上了。

越“城镇化”,人们的效用满足就会越大。这恐怕是现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否认的吧?

但如此一来,是不是就该全盘否定“要塞”的意义,就不分情况而什么“要塞”也不要了呢?不然!瓦格纳教授说得对,真正的“要塞”是要有相应“准则与机制”来加以区别内外的。如不然,没有了理性准则与机制的支撑,市场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转、全球良好秩序的维持以及人类文明进步,也就谈不上。即便是全都有了“城镇”,如果没有了内外之别,没有了起码的交易秩序,也就不是瓦格纳意义上的“城镇”了。况且,诚如我在专栏中所一再强调的,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从微观上讲,没有了亚当·斯密所揭示的一个个追求“一己私利”而相互有别的理性个体,就不会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也就不会有高效而公正公平的社会集成效果;从宏观角度看,之所以贸易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货币战争”不断升温,带有最原始残忍本性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止过,还不是因为处于“货币文化”时代的人类文明仍有着国家与国民利益之别吗?既然有着“利益之别”,就必然存在着以“准则与机制”支撑的理性“要塞”。所以,只有那些基于一国国民利益或着一国国民服务的经济学,才可能在全球经济学界争得一席之地,因为其根基深厚,目标明确,学术素养越高,就越多地参与制定或改进规则,倡导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因此,没有了“城镇”的“要塞”,将会不堪一击,也就不成其为“要塞”了;没有了必要理性“要塞”的“城镇”,将会是一片无

序中的混乱,也难以持续发展。

所以,在过去这些年“推倒要塞”与“建设城镇”的过程中,那种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否定并推倒“要塞”的倾向是值得好好反思与总结的。比如说经济领域,不顾我们的发展阶段及其变化,不顾境内本土资本与人才实力的增强与需求,一味为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税收优惠到没有了底线与原则,对资源的有效持续利用缺乏计划与把关,在尚不成熟的金融领域对外宽松对内严格,有些要害监管部门在用人上一味“贪洋重外”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是罔顾建设“城镇”所必要的理性“准则与机制”的结果。代价是大家都不愿见的:有限土地被低价低效利用,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消耗无度,本土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机会下降,税收制度割裂,内外资本与人才处于不公平竞争之中。

近一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要塞”与“城镇”的问题。在越来越理性也越来越有力的呼声下,我们看到了以“两税合并”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制度的改革,看到了以“降耗减排”为手段的有关环保与资源的宏观政策,看到了刚刚通过的“反垄断法”对有关外资涉及国家安全内容的重视与相应审查的界定,看到了“金融改革重在放开管制”的政策倾向,看到了以重视能力与行业经验——多做事做成事——为核心的人才利用原则的回归。在不断交付学费之后,我们在进一步建设充满活力并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城镇”的过程中,终于开始重视那些有着“准则与机制”支撑的“要塞”的建设与作用了。

在伟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伟大复兴之路上,“城镇”与“要塞”缺一不可。

■江户物语

## 历史疮口再一次淌血

由于在7月底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日前改组了内阁,以争取改善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提高支持率。此举究竟能否奏效尚待观察,但东京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形象早已塌陷。因为安倍走马上任以来在诸如慰安妇等问题上明显倒退,以至在日本参议院选举的次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谴责日本政府在战时强征慰安妇的决议。这对安倍以及日本的右翼政治势力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的1932年,日军就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慰安所”,此后随着战事的不间断扩大,在日军人数骤增,类似设施也越来越多,无数中国良家妇女惨遭蹂躏,其人权遭到严重侵犯,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除了中国以外,在当时日军所占有的朝鲜半岛、南洋各国,慰安所也比比皆是。

日本战败后,虽然军国主义的战犯们受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正审判,诸如东条英机等首犯被处以绞刑,但由于在随后出现的冷战中美国急需通过日本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来形成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于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头目们网开一面,这就使包括曾被定罪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都能够摇身一变重返政坛出任首相。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日本国内当然不会产生严厉追究其战争责任的氛围,对被侵略国家的赔偿也草草了事。更有甚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自感时机成熟后,便开始篡改历史,想方设法美化侵略战争,从而引发了周边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

由于东方国家的社会风俗,战时日军暴行的受害者们在战后漫

长的岁月里讳莫如深,羞于启齿。所以直到1991年12月才由韩国慰安妇首次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当时日本政府的反应还算过得去,1992年1月,时任首相的宫泽喜一在访问韩国时就就此表示道歉。此后在1993年8月,时任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就此发表谈话,再次道歉。这一谈话是作为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发表的,199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以此方式向有关国家受害者提供赔偿。尽管这种做法的彻底性和力度都无法令人满意,但毕竟还是认可强征慰安妇是国家行为。1996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公布了相关报告,指责二战中日军的这一行为迫使广大妇女成为“性奴隶”。当年8月,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向慰安妇致函表示歉意。此后的小渊内阁、森喜朗内阁乃至小泉内阁也都采取这一立场。

但在去年9月安倍走马上任后,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在这一问题上开始反攻倒算,全面推翻过去多届政府对此所持的立场。他们通过所谓的“调查”,喋喋不休地叫嚷“河野洋平谈话过时了”,说什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日本政府参与了强征慰安妇”。连安倍本人也同样如此,甚至还底气十足地表示: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再次道歉。于是连“亚洲妇女基金”也被宣布解散。

安倍政府的这一立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不满,尤其在其最为重要的盟国美国。由于在冷战时代和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战略中,华盛顿对东京都多有借重,在日本国际秩序根基时,白宫还能对此保持忍耐。但日本右翼得寸进尺,以为美国因需要日本的合作而会

无止境地忍耐下去,于是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变本加厉,从而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本来就对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极为不利,此时如果美国仍然保持缄默,无异于养虎遗患。因为美日本来就是二战中的交战国。作为战胜国,美国是无法容忍推翻过去的历史结论的。如果日本继续一意孤行,则表明它所奉行的价值观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而这是双方结为盟国的政治基础。作为当年曾占领日本多年、至今仍在日本设有军事基地的美国,当然无法接受这一挑战。今年6月,日本右翼势力居然在《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竭力否定其责任,其中包括44名国会议员。这一举动无疑更激怒了美国政坛。于是随后便在众议院外交小组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相继通过了谴责日本政府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承担相应历史责任,对今后任何否认这一责任的言行予以驳斥,对下一代进行相关教育。

尽管这一决议并没有任何约束力,但到底是美国众议院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其道徳压力将足以对日本右翼势力产生相当的威慑作用。就在今年3月,安倍刚表示不会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后,华盛顿随即通过官方渠道向东京表示了不满,于是安倍不得不立马改口,露出了软肋。尽管日本驻美国大使在利用其人脉关系,仍在竭尽全力阻止参议院通过类似决议和再通过与历史问题有关的其他决议,但事情恐怕不会就此打住。

今年是“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重要年份,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只会适得其反,增加其承担历史责任的成本。



■世话实说

##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对立统一——后WTO时代金融演义系列之三



程实  
金融学博士,供职于ICBC 总行

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在趋势转向和市场异变中渐趋增强的不确定性,让开放度与日俱增的中国进一步受到了外部共振的潜在冲击,内外合力之下,看似有悖常理的人民币汇率“外升内贬”的结构性差异,就是引人瞩目的最新例证。“差异就是矛盾”,以全球视角、辩证思维来审视,人民币汇率矛盾本质上是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剧烈震荡和中国金融改革稳健前行在对立统一间的一个时序擦肩,是中国经济内、外部均衡同时缺失下的一个货币倒影。

首先,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具有形式微妙的矛盾真实性。“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约,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但其弟子克拉底鲁和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利用巧舌如簧的诡辩向这道先世的思想曙光发起了攻击: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随后哲学思辨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发展证明,这种幻化矛盾实际上才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人民币汇率矛盾并非类似于“飞矢不动”或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货币幻觉,而是客观存在,只是它可能是以一种难以感知的复杂形式表现着。在通货膨胀不断高企的背景下,人民币的对内购买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对外升值这一面。

根据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权威数据,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今年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6.8%,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2.15%,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8.17%。显然,人民币升值的市场结构并非简单“升值”二字所能概括,对美元升值,对大部分非美货币贬值的差异性结构一直伴随着汇率的循序演进,并在最近几个月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更趋明显。鉴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首要权重,美元在国际市场标价和外汇储备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人民币“汇率篮子”中的较大比例,用“对外升值”概述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外部特征是真实贴切的,不过就此忽视其背后复杂汇率结构显然有失偏颇。

其次,对立是统一体内部的对立,在对立面的相互对立中存在着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如果从中国经济的视角审视人民币汇率矛盾,只能看到货币价值对内和对外不同趋向的相互对立,如果将视角放大到整个世界经济,那么均衡汇率决定理论足以解释同一种货币对立市值趋向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从内部看,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使得周期性风险潜在积累,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信贷增长较快、外贸增长较快、资产价格高企等“过热”现象的存在给物价稳定带来了较大冲击,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从外部看,通货膨胀带来的对内贬值

构成了对外贬值的动力之一,但这并不是构成人民币对外汇率这一“双边货币比价”市值变化的唯一动力,因为人民币还面临着对外升值的一系列动力,比如实际汇率在汇改过程中向均衡汇率的趋近,中国经济处于上行阶段与主要西方国家走进下行阶段的周期性对比,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稳健紧缩与主要西方国家潜在宽松的风格对比等。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国经济基本面、政策搭配和交往程度的不同,人民币在对外汇率结构中的国别差异是显著存在的。美国经济受“次级债风波”影响相比欧洲各国较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异变相比欧洲央行较强,美国经济基本面周期性调整相比欧盟较晚,这意味着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大于贬值压力,而中欧之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要弱于贬值压力,这就导致“人民币对美元走强,对欧元走弱,同时欧元对美元走强”的汇率结构。可见,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不完全对立,对内贬值之所以没有带来对外贬值,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元贬值更为剧烈,而美元恰巧又是对人民币而言最重要的外部货币。

最后,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具有趋向同一的发展方向,人民币汇率结构最终会在互促发展中趋向同一。从本质上看,外升和内贬并存是中国经济内、外部均衡同时缺失的货币反映,因为均衡汇率本身就是“内外均衡同时实现即的汇率水平”(姜波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型、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意味着内部均衡的改善指日可待,而内部均衡的优化将给外部均衡的回归形成助力。由于美国周期性风险的客观存在、国际政策博弈的均衡化和全球保守势力的不断抬头,中国外部均衡的实现需要较长时间的多边角力,这将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存在,实际汇率同均衡汇率的完美拟合尚需时日。无论如何,经济均衡在政策指引下的趋向改善将给外升和内贬值现象的缓和与消失奠定基础,随着资本流动的日渐通畅和内部需求的有力增强,人民币汇率将在中长期稳健趋向均衡水平,表现为对内的市值稳定和对外的有弹性稳健升值。

人民币汇率矛盾,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局部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发展之间的摩擦火花,仅仅将其归因于中国经济自身的资本管制或是货币国际地位较低恐怕有失全面。在国际保守势力对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汇率制度改革施加压力,美国于政治周期中试图“内部次级债危机成本外部化”的当下,人民币汇率矛盾很可能成为保守势力进一步有所作为的借口由头,只有充分明了世界经济和别国政策在中国汇率矛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同经济强权“奉陪到底”。毕竟,世界是平的,唯一一马平川地俯视天下,才能对异常经济现象的背后机理了然于胸。

## 货币危机链条最薄弱一环



管清友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学者,经济学博士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货币是件太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货币是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货币结构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也会对经济产生深远而预料不到的后果。但在很大程度上,货币又是一个看不见的因素(见《货币的祸害》)。就如同“在1873年的铸币法中删掉一行字就把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搞糟了几十年——实际上是近乎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一样,1971年尼克松总统让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图景。

金本位制具有防止各国贸易账户失衡的自动调整机制,当贸易失衡给赤字国家带来经济萧条压力,会通过两国相对价格的变化自动调整。因此,在金本位制下,贸易失衡不会维持很久,世界经济不会产生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现象。

1973年以后,世界几大经济体的货币与黄金脱钩,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而美元本位制正是全球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的根源。近年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本质上是纸币本位下的一种货币现象,它与全球经济失衡密切相关。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把美元负债输送到主要贸易伙伴,而后者把产品以信用方式销售到美国。之后,美国的贸易伙伴将其贸易盈余(如东亚地区的巨额贸易顺差、中东国家的石油美元等)重新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从而使美元回流美国。这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但是,美国贸易伙伴的贸易盈余大量增加,美元储备资产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内部银行信用膨胀,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暴涨,并经历从繁荣到衰退的泡沫破灭过程,对该国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造成打击。同时,美国国内也会因为美元回流造成资产价格膨胀。由于美国持续大量输出美元负债,美元信用受到各国质疑,美元对其他货币和黄金的汇率便呈大幅度下跌趋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也面临调整压力。各国经济繁荣时期的生产能力扩张、过度投资会成为下一个经济衰退时期通货紧缩的主要来源。美元本位制的缺陷使得世界经济栓上了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膨胀、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链条。

##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金融市场的传染性和脆弱性也大大不同于以往。美国的一场次级债危机就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流动性过剩的形势很快逆转。以往的经验表明,外围国家虽然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在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时也是首当其冲。

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的问题是,石油输出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大部分没有用于消费,而是被储蓄起来,因而导致全球实际利率偏低。于是,资金首先流向了全球信用最好、意愿最强的美国市场,致使美国实际汇率上升,经常账户赤字大幅度增长。这一面的理由成了美国最好的自我辩护词。

硬币是两面的,而我宁肯相信美元本位制是硬币的正面。毕竟,30多年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是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无数的研究也证明了脱离黄金之后的“美元的祸害”,美元实际上失去了支撑。《美元的坠落》的作者安迪森·维金给我们描述了这个熟悉的场景:“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终结了美国货币与黄金本位之间的姻缘。从此以后,美国货币与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之间不再有任何瓜葛,它的唯一支柱就是国家信用。”安迪森·维金说GDP是最具有欺骗性的,美国实际上充斥着虚假的泡沫经济。而至今仍孱弱的美元则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存在于美国的生产率问题。“长久以来,在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中,美国一直处于劣势,这也是美国国际信用不断受损的根本原因”。

美元本位下的世界经济注定要经历通胀—通缩—通胀周期往复,所以大家看到,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十年八年就要来一次,美元也注定陷入强弩之末的宿命,美元崩溃的风险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柏林墙倒塌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时代,全球大市场规模空前,金融市场的传染性和脆弱性也大大不同于以往。美国的一场次级债危机就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流动性过剩的形势很快逆转。以往的经验表明,外围国家虽然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在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时也是首当其冲。

是的,货币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他们设计的货币制度跟世人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从货币体系角度看,我们无法摆脱“不在泡沫中疯狂,就在泡沫中灭亡”的宿命。泡沫造就繁荣,也造就毁灭。环顾世界,股市中疯狂,资产价格膨胀让人们感受到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下的“大繁荣”,而“大萧条”时代早已被人们封存在记忆里,永远不会“YESTERDAY ONCE MORE”。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一定是不同的,但人性的弱点不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太多变化。不过,金融市场上流行一句话:如果要生存下去,你得学会进化。

但是,回归金本位不见得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最好选择。回到原始的金本位制无疑相当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希图通过黄金挽救美元泛滥也是徒劳。要害的问题是维系国家信用,控制全球货币之间的增长速度。这是一项全球公共产品,没有大国之间的协调和相互监督不可能完成,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世界的中央银行的改革也不能完成。理查德·邓肯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当必要的工具都已经具备后,需要的就是领导力和政治家般的坚强意志,以创造出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问题是,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边。